

历史是什么？

[英]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



商务印书馆

历史是什么？

1961年1月至3月间在剑桥大学
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中的讲演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

吴 柱 存 译

6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81年·北京

Edward Hallett Carr

WHAT IS HISTORY?

The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s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January-March 1961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1963

根据纽约艾尔弗雷德 A. 诺夫出版社 1963 年版译出

内部发行

历史是什么？

〔英〕爱德华·霍列特·卡尔 著

吴柱存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6 印张 120 千字

1981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500 册

统一书号：11017·501 定价：0.65 元

序 言

荷兰历史学家盖尔说过一句很机智的话：“历史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辩论”。对于“什么是历史？”这个历史学中的根本问题，也是众说纷纭，看来同样要继续辩论下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英国久负盛名的史学家卡尔(1892—)^①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颇具独到的见解，富有启发性，但自然只是一家之言。

卡尔在本书中所表述的中心思想，就是“把历史当作一个不断前进的过程，历史学家则在这过程之中随之前进”(146页)。他认为，历史学家的著作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反映，是“由时间与地点在内的环境塑造成的”(43页)。“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28页)由于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解释，对于有意义的和有联系的东西的选择，是随着新目标的在前进中的不断出现而改进的，因此他又说，历史是“过去的事件跟前进中出现的将来的目标之间的谈话”(135页)。但这并不是说可以把新的解释与旧的解释不加区别，等量齐观。卡尔举例说，历史学家一度曾以宪法和政治为根据来解释过去。后来，当经济和社会的目标开始

^① 卡尔专长国际关系史和苏联史，一生著述很多，影响最大的是多卷本的《苏维埃俄国史》。

代替了宪法和政治的目标时，历史学家们便转而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解释过去。“既然具有经济和社会目标的任务，比起具有政治和宪法目标的任务来，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代表更宽广的和更先进的阶段，那么，从经济和社会方面来解释历史便可以说代表着比单纯的政治解释更为先进的历史阶段。”(135页)这些看法，无疑含有正确的因素，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

但是，卡尔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在阐明上述主张的同时，又往往流露出一些唯心主义的、甚至自相矛盾的观点。他想把“规律”的概念排除于科学之外，而代之以“假设”的概念。他说，二十世纪的科学家不再象十八、九世纪的同行们那样相信规律的存在了，“如今，无论科学家或历史学家都怀着一种比较谨慎适中的愿望，想从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向另一个不完整的假设前进”(64页)。他断言，无论是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规律、拉萨尔关于工资的铁的规律，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所有这些提法都“显得既有些陈旧，同时也有些傲慢”(60页)。对于马克思所说的“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他也认为“这不能算作一条规律”，“却是一种有益的假设”(62页)。卡尔的这种看法实质上否认了客观真理的存在，与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设基本上一样了。但是，客观真理是存在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科学分析，已为实践所证明，它确实确实是真理，而不是什么“有益的假设”。

当然，任何一个历史学家，不论是多么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不可能穷竭真理。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谁要是在这里猎取

最后的、终极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末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29页）。但是，这绝不是说，一切历史学家的著作彼此一样，无非都是些不完整的假设。我们在记住上述恩格斯的那段话的同时，不可忽略：唯物主义辩证法包含着相对主义，但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36页）盖尔和卡尔的观点，在指出历史评价永远在变化之中这一点上是对的，但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陷入了相对主义，而不懂得或不承认“绝对真理是由相对真理构成的”（同上书第133页）。

卡尔对于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有一些比较正确的看法。他承认伟大人物的历史作用，但反对把“伟大人物放在历史之外，认为这些人是依仗他们的伟大强使历史依从自己”（55—56页）的看法。他还指出，“认定个人天才是历史的创造力量的愿望，是历史意识的初级阶段的特点。”（45页）对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卡尔则认为“历史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个数目的问题。”（50页）他说：“一切有效果的运动都只有很少几个领导人物，但是有大批的追随者，而这并不是说这大批人对他们的取得胜利毫不重要。数目在历史里是举足轻重的。”（51页）但是，这不单纯是个数目的问题。要知道，量的变化到一定程度时就会转化为质的差别。马克思曾以协作为例，说明“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

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资本论》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362 页)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就产生了“新力量”。这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至于伟大的革命运动,那是“只有当千百万人万众一心、一致奋起的时候,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7 卷第 476 页)历史归根到底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

对于历史有无价值的问题,卡尔是持肯定意见的。他指出,历史学家必须进行概括,并通过概括,“把从一连串事件中所获得的教训运用到另外一连串事件上去”(70 页),从而“为将来的行动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南。”(72 页)他不赞成那种认为人们向历史学不到任何东西的看法,说这是“为大量显著的事实所批驳的”(70 页)。

最后,我们有必要注意一下作者在本书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精神。他明确宣告他对社会的未来,对历史的未来充满信心,在本书的结束语中说了下面这样一段颇有诗意的话:“刘易士·纳密尔爵士警告我,叫我远远避开计划和理想,奥克肖特教授告诉我,我们不是朝一个特定的目标进发,最重要的就是小心别让人把船弄得摇晃不定,波珀教授想依靠小小的点滴管理,在路上保留下那个原有的亲爱的 T 字形拐角,特雷弗·罗珀教授对准大嚷大叫的激进派人士的鼻子打了一拳,而莫里森教授则呼吁以理智的保守精神写出历史,在这时候,我将展望这个在动乱中的世界,在阵阵剧痛中的世界,而且将借用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大家用得有些陈旧了的词句回答说:‘可是地球还是运行呀!’”(171 页)卡尔是一位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而且是已经没落的大英帝国的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但是他仍然毫不气馁地要追求历史的未来，不满足于点滴的改良，也不怕在惊涛骇浪中翻船。我们，人民中国的无产阶级历史学家，难道不应该比他更信心百倍地展望共产主义的光明远景，充分发挥历史科学的战斗作用，竭尽全力地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吗？

齐 华 甫

一九八〇年十月三日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事实.....	1
第二章	社会与个人.....	29
第三章	历史，科学和道德.....	58
第四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	93
第五章	作为进步的历史.....	118
第六章	在扩展中的天地.....	146
索引		172

第一章 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 事实

历史是什么？为了免得有人认为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或者提得多余，我打算在本文中引用两段与第一版和第二版《剑桥近代史》分别有关的文章。阿克顿在 1896 年 10 月就他负责编写的这部著作向剑桥大学出版部的委员们提出了一个报告，其中这样写道：

这是以对于绝大多数人有用的方式，把十九世纪将要遗留给后代的知识详加纪载的绝好机会。……根据恰当的分工，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也是能使国际研究中的最新文献和最成熟的结论深入人心的。

在我们这一代还不可能有终极的历史。然而我们能够抛弃因袭的历史。既然一切情报资料都可能得到，每一问题都有可能加以解决，我们也就能够指出从这一历史过渡到另一历史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到达的境地。^①

几乎整整六十年以后，乔治·克拉克教授^②在他为第二版《剑桥近代史》写的总导论中，对阿克顿及其合作编著者相

① 《剑桥近代史：本书缘起、作者及其编写经过》(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7), 第 10—12 页。

② 原文为 George Clark。——译者

信有一天终将产生“终极的历史”这一提法作了评论，接着指出：

后世的历史学家并不向往这么一种前景。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一再被后人超过。他们认为过去的知识是通过不止一个人的头脑而流传下来的，并且是经由他们“加工处理过”的。因此，这种知识不可能包括一些基本的、与个人无关的、任什么也改变不了的因素……这样的探索仿佛是无止境的，可是有些缺乏耐心的学者却在怀疑主义之中找安慰，至少是在这样一种学说之下找安慰，这就是：既然所有的历史判断都牵涉到人和观点，而此人此一观点跟彼人彼一观点又各有千秋，因而便不会有“客观的”历史真实了^①。学者们彼此大相径庭的地方，正是这一领域有待于探究的所在。我希望我本人还能够赶得上时代，因而认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写的东西无非是些无稽之谈。不过，我也还不会先进到这样一种地步，乃至醉心于这样一种看法，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写的任何东西必然都是很有道理的。的确，你们可能已经想到，这种探索容易超出范围，涉及甚至比历史的性质这种问题还要广泛得多的题目。阿克顿跟乔治·克拉克爵士的冲突，反映了在他们两个提出两种看法的这一段时期之间、我们整个的社会观的改变。阿克顿说出了一种积极的信念，这是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能明辨是非的自信心。乔治·克拉克爵士则跟垮掉的一代的惶惑不安以及心意缭乱的怀疑主义起了共鸣。当我们试图回答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我们的

^① 《新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7)，第24—25页。

回答便有意或无意地反映出我们自己在这一时代的地位，而且也构成了对另一范围较广泛的问题的回答的一部分，这个问题便是：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我并不担心我的课题在精心的考察之下，显得有些琐细平凡。我所担心的只是，我提出了这么个既广泛又重要的问题，显得有些不揣冒昧。

十九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艰难时世》^①这部小说里的葛雷格来德先生说：“我所需要的是事实……生活之中所需要的只有事实而已。”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总的说来是同意他的。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当朗克很正当地抗议把历史当作说教时，他说历史学家的任务只在于“如实地说明历史(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并不怎么深刻的格言却得到惊人的成功。德国、英国，甚至法国的三代的历史学家在走入战斗行列时，就是这样像念咒文似的高唱这些有魔力的词句的：“如实地说明历史”——这句咒文也像大多数咒文一样，编制出来就在于使他们自己释去一肩重负，不再进行独立思考。实证主义者，力主把历史当作科学，因而对于崇拜事实这一点给予了很大的影响。实证主义者说，首先确定事实，然后从这些事实之中得出结论。在英国，这种历史观恰恰适合于从洛克到伯特兰·罗素的作为英国哲学主流的经验主义的传统。经验主义关于知识的理论是预先假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完全分离。事实，就像感官印象一样，从外界向观察者袭

① 《艰难时世》是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于185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葛雷格来德是书中主人翁之一。——译者

来,是独立于观察者的意识之外的。接受的过程是被动的:接受了资料之后随即就这些资料采取行动。缩编牛津字典是一部有用的辞书,可也是一部有倾向性的经验主义学派的辞书。它给事实一辞下的定义就是:“区别于结论的一种经验的资料”,这样一来便把两个过程截然分开了。这可以说是对历史的一种普通常识的看法。历史包括一个确定了的事实主体。历史学家可以从文献、碑文等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历史学家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所喜爱的方式加以烹调,摆上餐桌。阿克顿的口味比较纯朴,便把它们做得清淡一些。在他给第一版《剑桥近代史》编纂人的指示信中,他宣布了这样的要求:“我们的滑铁卢必须使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同样都能满意。如果不查阅作者名单,便没有人能看得出牛津的主教在什么地方停下了笔,以后是费边恩还是加斯奎特,是李伯曼还是哈里逊接着写下去的。”^①就拿乔治·克拉克爵士来说,尽管他批评了阿克顿的态度,他自己也是把历史中“事实的硬核”跟“裹在外面的、果肉似的、有待争论的解释”^②相对比的一——这里他也许竟忘记了果子的果肉部分比硬核部分给人的好处要多得多。首先弄清你的事实,然后冒险投身于解释的流沙之中——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凭藉常识的历史学派的金科玉律。这不禁使人想起伟大的自由主义新闻记者斯科特^③的名言:“事实是神圣

① 阿克顿:《近代史讲演集》(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 London, Macmillan & Co.; 1906),第318页。

② 引自《听众》(The Listener, June 19, 1952),第992页。

③ 原文为C. P. Scott。——译者

不可侵犯的，意见却是不受拘束的。”

这显然是不行的。我不想从事一场对我们过去知识的性质作哲学上的讨论。为了当前的目的，让我们假定凯撒渡过卢比孔河这一事实跟这屋子当中有一张桌子这一事实，是同类的事实，或者是可予比较的事实，这两件事实以相同的形式，或者以可予比较的形式，进入我们的意识之中，而它们跟知道这些事实的人的关系，则都具有一种客观的性质。可是，甚至在这种大胆的、不大能自圆其说的假定之下，我们的论据仍然立刻碰到这样的困难，即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都会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加以处理。那么，区别历史事实跟其它关于过去的事实的标准是什么呢？

什么是历史事实？这是我们必须较仔细地加以研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常识的看法，有一些基本事实，对于所有历史学家说来全是一样的，这就构成了所谓历史的中枢——例如，哈斯丁斯战役发生在 1066 年这种事实就是如此。然而这种看法还要求从两个方面加以考察。首先，跟历史学家有根本关系的并不是像这样的事实。知道这次重大战役是在 1066 年而不是在 1065 年或 1067 年打的，是在哈斯丁斯而不是在伊斯特本或布莱屯打的，这无疑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不能把这些弄错了。不过，提出了这类论点以后，我就想起了豪斯曼的说法：“准确是责任，不是美德。”^① 称赞一位历史学家叙述准确，就像称赞一位建筑师在他的建筑中用了干燥的木材，或者适度的混凝土。这是他进行工作的必要条件，却不是

^① 梅里利亚斯：《天文：卷之一》（M. Manilius: *Astronomus: Liber Primu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7），第二版，第 87 页。

主要职能。正好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历史学家有权利依靠所谓历史学的“辅助科学”——考古学、碑铭学、古钱学、年代学等等。历史学家并不要求具备一个专家那种特有的技能，鉴定陶器或大理石残片的来源和年代，辨认费解的碑铭，为确定精确年代费尽心思作出庞大数字的计算。这些所谓基本事实对所有历史学家全是一样，通常属于历史学家的素材的范畴，而不属于历史本身的范畴。第二个需要考察的便是：确定这些基本事实的必要性并不在于这些事实本身的任何特质，而在于历史学家“既有的”决定。尽管斯科特的格言是如此，但每个新闻记者今天都知道，影响舆论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选择和安排适合的事实。过去有这样的说法：事实本身就能说话。这一点当然并不真实。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我记得是彼兰德罗的剧中人物之一说过，事实就像一只袋子——你不放一些东西在里面，它是站不起来的。我们之所以很想知道这次战役是1066年在哈斯丁斯进行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历史学家把它当作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正是历史学家，按照他自己的理由来决定凯撒渡过那条小河卢比孔是一个历史事件，而在此前后，成百万的其他的人渡过这条河，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半小时以前，你走路，或者骑自行车，或者乘汽车来到这栋房子，这一事实跟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一样，也是一个关于过去的事实。可是，这一事实大概不会被历史学家们所重视。塔尔科特·帕森斯教授^①曾经把科学叫做

^① 原文为 Talcott Parsons。——译者

“以现实为明确方向的、经过选择的体系”。^①这句话也许还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不过，历史除开还是别的一些东西以外，也就是这个。历史学家当然是要选择的。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地、独立地存在于历史学家的解释之外，这是一种可笑的谬论，然而这也是一种不易根除的谬论。

让我们看一看一件单纯关于过去的事实变成一件历史事实的过程。1850年在斯塔利桥威克斯地方，一个卖假货的小贩跟人发生了小小的口角，竟至被一伙暴徒踢死。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么？一年以前，我本来会毫不犹豫地说，这不是。这件事由一个目击者记载在某一本不甚知名的回忆录里。^②我从来没有看见任何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件。一年以前，基特森·克拉克博士^③在牛津的福德讲座的讲演中提过它。^④这就使这件事变成一个历史事实了么？我认为还没有。我觉得它目前的身份是有人推荐它加入经过精选的历史事实俱乐部为会友。它现在仍在等待附议人和赞助人。在今后的几年里，我们也可能看到这一事实先在有关十九世纪英国的文章和书籍的脚注里出现，然后在正文里出现。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它可能成为一件确定不移的历史事实。反过来说，也许没有人再提起它，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会落入

① 塔尔卡特·帕逊斯与爱德华·希尔斯：《向行动的一般理论前进》(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A. Shils: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3rd. 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第167页。

② 乔治·桑格：《七十年的头面人物》(Lord George Sanger: Seventy Years a Showman,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26), 第188—189页。

③ 原文为 Kitson Clark。——译者

④ 这些讲演最近将用《维多利亚英国之形成》(The Making of Victorian England)这一书名发表。

有关过去的非历史事实的深渊之中。基特森·克拉克博士一片侠义心肠原想从这深渊之中把它挽救回来的。究竟什么东西决定这两件事情之中哪一件会发生呢？我想这要取决于基特森·克拉克引证这一事件来支持的那个命题或解释，其他历史学家是否也认为很有根据和意义。它作为历史事实的身份的关键，就在于解释这一问题上。解释这一因素渗入每一件历史事实之中。

可否让我提起一件本人记忆中的事情？好些年前我在这个大学里念古代史的时候，我有过一项专题研究叫“波斯战争时期的希腊”。我收集了十五册或者二十册的书籍放在书架上，而且认为在这些书里，我所需要的有关我的题目的材料全都有了。我们可以假定——而且也非常接近于事实——这些书籍是包括了当时已经知道的，或者当时可能知道的一切事实。我从来不曾想过要去追问，从以前有人知道过的堆积如山的事实之中，到底经过甚么偶然的机会或者什么样的消逝过程，这些精选的事实才保留下来成为历史事实。我猜想，甚至在今天，古代史和中古史令人神往的道理之一便是：它给我们一种错觉，使我们以为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我们已经有了——一切可供处理的事实。在这里历史事实和其它关于过去的事实之间的讨厌的界限已经消除，因为已知的这点点事实全是历史事实。研究过这两个时期的伯里说过：“古代史和中古史的纪载中到处都是漏洞。”^①历史曾被叫做一具缺了许多零件的巨大的机器钢丝锯。不过，主要的麻烦并不在于漏洞。我

^① 伯里：《短论选集》(John Bagnell Bury: Selected Essay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0), 第 52 页。